

# 瑞士与中国： 渐行渐近的文化进程

瑞士在中国的经济和文化活动

戴尚贤 著

马洁宁 译

# 瑞士与中国：渐行渐近的文化进程

瑞士在中国的经济和文化活动

戴尚贤 (Jean-Jacques de Dardel) 著  
马洁宁 译

“……亚洲是世界上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其中的翘楚则是中国。从今以后，我们可以确定的是，21世纪持续见证了中国的崛起，或者应该说是回归。但是，这一了不起的成功也会激起新的挑战，涉及社会、经济、政治、司法和环境各方面。瑞士作为中国的朋友和合作伙伴，与中国并肩巩固繁荣、稳定和现代化。例如，我们两国紧密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并逐渐实行低碳排放量的经济。此外，我们的关系也以频繁的双边交流为特点，其中多种多样的对话起到了主导作用。我们欣赏这种形式的合作，因为这使我们能够针对与政治、环境、可持续发展、移民和教育问题进行讨论，并取得丰硕成果。在关于人权的对话的框架下，我们探讨了诸如少数民族问题等主题。这一形式的讨论有利于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就具体话题进行谨慎交流。

经济和金融部门构成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支柱。瑞士和中国一样，都对健康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的繁荣投入了大量精力。两国维持着紧密的经济关系：今天，中国成为了瑞士在亚洲的主要商业合作伙伴，和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第三大商业合作伙伴，仅排在欧盟和美国之后。我们之间的交流潜力还未被完全开发。

.....

占据两国关系的中心位置的，始终是人與人之间的联系。这不仅指的是商业关系中的先驱，也包括小学生、大学生、教师和科研人员之间越来越多的联系，以及密集的文化交流。……

我们确信，只要我们两国携手，继续发展最近几十年来建立起来的良好合作关系，并且继续展示出各自的勇气和以先锋姿态跨入新时代的创新精神，就够达成我们共同确定的其他目标。”

王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迪埃·布克哈尔特，瑞士联邦外交部长

《时报》(Le Temps), 2015年9月14日

# 目录

致谢	01
序言	02
超越符号	06
背景与背后的意图	08
直击要害	
瑞士对外政策的发展	
国家文化政策的诞生	
中瑞关系的新篇章	16
第一次接触	
外交关系	
第一个三十年	
腾飞	
飞跃	
文化层面	40
文化交流	
展望明天……	
关于插图	50
费尔南·吉贡 (Fernand Gigon)	
加比·斯坦纳 (Gaby Steiner)	

# 致谢

实力、热情、行动力、无数的美好愿景促成了这本小书。瑞士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裴雅珍 (Jenny Piaget) 女士, 瑞士驻上海领事馆副领事安娜·马特 (Anna Matte) 小姐, 以及她的助理张慧颖小姐, 从这本书的出版计划之初便投入了心血。同时, 我还要感谢我们使馆方面的张娜小姐、车丛丛小姐和安娜·马蒂斯 (Anna Mathis) 小姐, 没有她们的工作, 您可能无法阅读到此书了!

瑞士摄影基金会主席彼得·普夫朗德 (Peter Pfrunder) 先生慷慨地向我们提供了费尔南·吉贡 (Fernand Gigon) 拍摄的照片, 并进行了甄选。加比·斯坦纳 (Gaby Steiner) 女士同样无私地将一组自己的摄影作品展现出来。我要向这二位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们还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陈群教授, 副校长任友群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王焰女士, 副社长龚海燕女士所给予的帮助。这些宝贵的帮助真正地为中瑞合作描绘了一幅蓝图。

最后, 我当然要对蔡方柏大使所撰写的前言表示谢意。一位中瑞关系专家的卓见对我而言弥足珍贵。



序言



2015年，中国和瑞士通过隆重庆祝建交六十五周年，把堪称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典范的中瑞友好合作推向了新的高潮。2016年伊始，瑞士联邦驻华大使戴尚贤先生撰写了《瑞士与中国：渐行渐近的文化进程》的力作。这是两国文化交流中的一件喜事，定能为进一步加深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新的贡献。谨向戴尚贤大使先生表示热烈祝贺！

大使先生希望我能为此书撰写序言，我就成为第一个拜读其法语版本的中国读者。戴尚贤先生以大使的权威和学者的笔触对瑞士的外交政策和中瑞接近文化（Une culture du rapprochement）作了生动、简洁的描述，从中可以观察到作者对中瑞接近文化丰富内涵有着独特见解。

首先，政治先行，为两国关系发开拓了广阔前景。十六世纪初以来，瑞士就奉行中立的外交政策，二战后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更好维护本国的权益，提出了“普世（universalité）、“团结”（solidarité）、“服务”（disponibilité）三原则，使其对外政策内涵得到充实和发展。“普世”原则就是超越意识形态和地理障碍同世界各国建立关系；“团结”，即通过与世界最欠发达国家进行发展合作，与南方国家<sup>①</sup>发展关系；“服务”，是为解决危机和冲突进行斡旋。作者在书中披露，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第七天，具有战略眼光的时任瑞士联邦主席兼外长马克斯·珀蒂彼爱尔就根据“普世”原则，于1949年10月7日推动联邦委员会承认新中国。尽管此举遭到外部大国的压力和国内舆论的反对，他仍坚持



<sup>①</sup>指发展中国家。——编注



其主张，并通过多次不懈努力，终于取得成功。1950年1月17日，他以瑞士联邦委员会主席名义致电毛泽东主席，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并准备与其建立外交关系。后经多次谈判，于1950年9月14日双方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并决定互派使节。瑞士成为最早承认新中国并与其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中瑞关系从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瑞士也给中国人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第二，经贸跟进，为两国关系稳定、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瑞士重视发展双方经贸关系，但不急功尽利，而是着眼于长远发展前景。两国建交初期经贸往来较少，仅600多万美元的贸易额。但是，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瑞士清醒地看到双边关系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取得进展，敢为天下先的瑞士企业家抢占先机，在两国经贸、金融合作领域创造了多个“第一”。1980年，当其他西方国家企业还在观望时，瑞士迅达集团在北京成立中国第一家工业合资企业，生产电梯。2007年，一些西方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时，瑞士成为欧洲率先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之一。2013年，瑞士成为第一个与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欧洲大陆国家，当年两国贸易额增长迅猛，达到近600亿美元，同比增长126%。2015年，瑞士再次顶住外部大国的压力，申请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

上述多个“第一”凸显了中瑞关系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中所起的引领作用。

第三，文化交流助力两国关系不断深化。中瑞双方都是具有悠久历史和包容性文化的国家。两国人民都为对方的优秀文化所吸引。有关民调显示，在中国公众对50个国家评价排名中，瑞士占据第五位，再次表明瑞士在中国公众中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形象。从广义文化角度讲，瑞士的创新与发展、教育与职业培训、

城市规划与管理、企业文化与对话文化等都值得中国借鉴。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诸子百家治国安邦的智慧和现代文化艺术也受到瑞士公众的青睐。许多瑞士博物馆举办了多样化的中国文化艺术展。例如，兵马俑在瑞士展出就吸引了32万多观众，中国的交响乐团和芭蕾舞团的巡回演出也受到瑞士观众的热烈欢迎。两国文化上的包容互鉴，进一步加深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认知，进而助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第四，管控好分歧和矛盾是两国接近文化的重要一环。两国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不同，双边关系中产生一些分歧和矛盾也属正常。更重要的是，双方能从两国关系大局出发，管控好分歧和矛盾，在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和磋商求同化异使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

展望未来，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在实现两个百年的伟大奋斗目标中，瑞士为应对新挑战，争取更大、更高的发展进程中，中瑞包容互鉴的接近文化将把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推向新的顶峰，创造出更多举世瞩目的“第一”，为世界和平与共同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

以上是我阅读戴尚贤大使先生力作后的几点感想，是为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前驻瑞士、法国大使

第九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蔡方柏

2016年1月10日于北京





超 越  
符 号

2015年一整年，瑞士和中国举办了一系列庆祝活动以纪念早已实现的两国邦交。许多关键的时间节点和经济事件常常被人挂在嘴边，几近陈词滥调。经济领域的合作确实是中瑞两国相互之间最为看重的方面，但是，除我们双边关系无法绕过的一些经贸领域的里程碑外，许多事件、具有前瞻性的决定和个人的往来活动都大大拉近了差异甚大的两国之间本该若即若离，且充满生意味的客套关系。在这一复杂的背景下，文化交流活动常常能够成为两国友好关系的“开瓶器”，或者成为点睛之笔。因为虽然瑞士并未将文化外交视为在异国奠定其影响力的先锋（一些有野心的大国正是这么做的），但是各种国家级别的机构依然派遣了各类创作者、艺术家及学者前往海外，为本国打出文化牌。

对文化活动的盘点和分析才刚刚开始，尤其是对瑞中关系的全面研究远未发其全力：直到今日，在瑞士仅有50多篇关于某个特定方面或局限于某个时期的文章。我们尤其要向克洛德·豪瑟（Claude Hauser）教授和他的助手们致以敬意，他们正依靠瑞士国家基金的支持进行相关研究。前期成果已于2015年9月4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瑞士日活动中得到介绍。此活动在上海秋季国际高校研讨会的框架下进行，而该项目已成功举办了十多年，邀请了中法两国各所大学，以及瑞士弗里堡大学的研究员参与其中，齐聚一堂，交流切磋<sup>①</sup>。中国学者<sup>②</sup>对中瑞关系越来越感兴趣，一些更深层次的研究也将会继续开展，这与八十年代之前的情况有着天壤之别。这种兴趣的增加与近年来趋向频繁的学生交流密不可分，而这也要归功于两国对双边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建设的巨大投入。

这本小书旨在就目前阶段向各界提供一个参考性建议，并突出中瑞关系的多面性，以免将双边关系简化成具体日期和数据。

①《瑞中关系六十五周年——瑞士日：文化外交的角色》（65 ans de relations Suisse-Chine. Journée Suisse: le rôle de la diplomatie culturelle），该研讨会由克洛德·豪瑟教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冯绍雷出席了此次研讨会。

②其中最近发表著作的一位：蔡方柏，《穷小山国缘何成世界首富：瑞士国家竞争力密码》，中国发展出版社，北京，2015年9月。





背景与背  
后的意图

# 直击要害

当代中瑞友好关系的建立,首先,是一项得到两国领导人支持的对外政治事务。随后,瑞士的企业家和经济决策者们尝试通过一系列投资和派驻活动以开发中国市场的潜能,并活跃至今,取得了相应知名度。相反,中瑞两国的文化联系长久以来一直时断时续,十分难以捉摸。谈及两国之间的文化关系史,就需探究瑞士文化外交在完全不同的两段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瑞士的总体文化政策的演变以及我们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的演变,是瑞士逐步融入战后世界的部分体现。

第一段分析,将中瑞文化关系置于我国的内部总体文化政策及其对东欧国家的延伸的背景下,也将涉及该政策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及其向不同意识形态发展中国家的扩展。此外,鉴于对双边关系的关注,文化关系则将被放在更宽泛的背景下进行审视,即自1950年开始发展的中瑞关系。为了更好地阐释本文主题,有必要从瑞士联邦的对外政策之演变开始梳理,并强调几个主要特点,从而使我们能够在更为清晰的参考框架下,对瑞士在中国的文化政策展开有针对性的思考。

对惯于五年计划的强大中央政府和一党代言10多亿人口<sup>①</sup>命运的大国而言,瑞士给其留下的最初印象无非是:抵抗最高领导,回绝上层指示,培养多样化的区域自治,鼓励以个人为中心的文化、语言及意识形态的多极竞争。总而言之,瑞士的发展并没有特定的方向。她既不盲目,也并不总能洞察未来,而是由各种社会力量组成的齿轮共同推动。虽然相互联动的齿轮不停地更改变化,但是整架机器的运行却是随意的、无法预料的。瑞士的历史并非一脉相承,因此人们也无法主观地建立起一条清晰的逻辑来解读或评论这个国家。由于我们的直接民主是各种合力产生的结果,因此要读懂瑞士的历史进程并非易事。然而这也使得对所有演变深层动力的分析、研究和思考变得饶有趣味。

<sup>①</sup>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大陆的总人口达到13.7亿。根据目前的数据推测,到2025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4.1亿,而到2050年,人口将回落到13亿。





## 瑞士的对外政策的发展

为了直奔主题，我们可以简单地概括：瑞士长久以来一直将经济当作一项真正的对外政策。在历经4个世纪的融合与征战之后，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瑞士联邦在欧洲大陆上的内部纷争终于尘埃落定，各州联合起来组成了一股力量。自十六世纪的前二十五年起，瑞士为使自已免于解体，开始确立中立国立场。毕竟当时的瑞士正在经受各种宗教、社会和政治势力的纷争。虽然，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初，尤其是十五世纪时，瑞士尚能对周边产生影响，但在那之后，就丧失了这种能力，反而屈从于外界的影响。

诚然，由于瑞士联邦由各小型主权国家组成，要在尊重当地自由的前提下始终维持各地之间的平衡实属不易。然而，这种平衡也逐渐树立了一个相较其他国家而言，等级更为简单的社会模型。而这也启发了不少外国哲学家。当然，瑞士这片土地人杰地灵，众多瑞士知识分子、建筑师、科学工作者和将士们为整个欧洲的文化技术贡献了力量。仅以法国为例，她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欧洲第一强国，启蒙时代（邦雅曼·贡斯当、斯塔尔夫夫人、让-雅克·卢梭）、法国大革命（马拉！）、法国王室军队，以及拿破仑军队中大量的瑞士军官（约米尼！），都见证了瑞士人在其中的作用。这些贡献虽然出自个人，但却深具瑞士气质。至于瑞士各州的文化影响力，除了人文主义或改良派大本营巴塞尔、日内瓦和苏黎世，一些哥特派画家，“瑞士”金银器和彩绘玻璃以外，不得不提到的是教育家们（裴斯泰洛齐 [Pestalozzi]）和众多服务于欧洲贵族阶层的家庭教师的贡献，以及许多来自意

大利裔和法裔，或在俄国定居的建筑师和工程师——从波洛米尼（Borromini）到泰拉齐尼（Terazzini），更为讲意大利语的瑞士地区增添许多荣耀。

瑞士直到十九世纪才开始小心翼翼地发展外交关系：首先是十八世纪末与法国建交。其实早在1522年，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就为了与联邦军队结盟，而在瑞士建立了第一个永久驻外大使馆。随后，大量人口从贫穷的赫尔维蒂<sup>①</sup>（Helvétie）地区流向美洲，这合理地解释了在当地设立领事馆的必要性，也孕育了后来多样丰富的外交活动。十九世纪后半叶，瑞士，主要是日内瓦，成为了国际仲裁法庭与和平交流之都，而瑞士自纳沙泰尔（Neuchâtel）人伊玛·德·瓦泰尔（Emer de Vattel）在十八世纪中期奠定人权理论基础以来，便一直承袭的司法传统可谓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亨利·杜南（Henri Dunant）于1863年创立国际红十字会，并吸引了一部分日内瓦贵族的加入，这亦使得日内瓦成为了人道主义活动的大本营。但是，整个国家及其政府还未主动从国家层面向外拓展其影响力。

十九世纪后三十年见证了瑞士的快速工业化过程，使其能够实现对遥远市场的开放。旅游业的发展，大量外国人的涌入，与外界的持续联系，国家的迅速富裕与现代化，这些都使瑞士对远方心存向往。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创痛使瑞士政府决意参与到于1920年1月在日内瓦成立的国际联盟的事务中。唉！开放与多边关系的活跃只得在极权主义与二战面前搁浅。自那以后，瑞士国内舆论一直普遍认为多边化这一选择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sup>①</sup>指瑞士。此处应指1798年成立的赫尔维蒂共和国。——编注

束之后，国家向围绕大型政府间组织建立的新多边机构及重建国际秩序关上了大门。战后重建的欧洲经历了两种意识形态的对峙和南北世界的对立，然而瑞士恰恰在此时实施了自己真正的对外政策，通过有的放矢的对外行动来保障国家利益。

在联邦参议员、联邦政务部（现在已更名为联邦外交部）部长马克斯·博蒂皮埃尔（Max Petitpierre）的倡导下，作为瑞士的国防与安全政策的基石<sup>①</sup>，其中立原则又增添了三个要素：“普遍、团结和灵活”。这一立场招致战后除丘吉尔政府<sup>②</sup>外许多同盟国政府的强烈批评。实际上，他们忽视了瑞士所承受的地缘政治压力。这种中立立场是需要参与到国际社会的协作中加以巩固的。二战刚一结束，瑞士就在欧洲开展了大规模人道救援活动，之后又自然而然地继续将这项活动延伸到南方国家，并将其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第三世界援助行动。我们与整个世界的联系也得到了增进，没有意识形态和地理屏障，只要某个国家需要帮助，我们就乐于提供服务，以解决潜在或公开的危机与冲突。

由于实地提供了许多合作服务，因而瑞士外交网络的性质发生了改变。1939年起，我们使35个相互间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派出超过200任的代表在此驻扎——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像瑞士一样，能够在一场冲突中协调各方利益。这

<sup>①</sup>于十六世纪提出，目的是预防瑞士联邦被宗教教派分裂，因为当时欧洲正在经历宗教战争。这一政策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得到了公开认可，并且允许建立主要起威慑作用的军队作为强有力的保障。永久的和拥有武装的中立立场使瑞士得以不受长久困扰其邻国的战争冲突的影响；瑞士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这项政策越发认同并不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

<sup>②</sup>温斯顿·丘吉尔在1946年9月访问了瑞士，并在伯尔尼市政厅的阳台上宣布：“你们刚刚经历了数年的考验和苦痛。在一个简单而稳定的制度的管理下，你们充满智慧地从危险与复杂的形势中全身而退。否则，你们很可能会面临毁灭……因为自由存于山峦；因为瑞士人民通过联邦制实现了许多社会民主的现代理念；因为瑞士人民懂得捍卫自己的自由，并对世界保持关注，乐于帮助他国：我正是因此而敬重你们的国家。”引用自米歇尔·考杜里（Michele Coduri）的《瑞士中国对对碰：不可能的延续？（1946-1955）》（*La Suisse face à la Chine, Une continuité impossible ? 1946-1955*），布鲁朗学院出版社（Academia Bruylant），新鲁汶（Louvain-la-Neuve），2004年，“人文科学论文”系列（Collection « Thèses de sciences humaines »），第十卷，第29页。